

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儒法斗争和王夫之的物质不灭原理

华 斌

(上海师范大学)

我国明末清初的法家、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在同当时的反动统治思想——程朱理学的斗争中,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传统,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提出了物质不灭原理。这比外国学者在十八世纪中叶第一次阐述的类似的思想,早了将近一百年。

所谓物质不灭原理,是指自然界发生的一切变化中,物质及其运动是永恒的;它不会消失,也不会无中生有;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它是自然界的一个普遍规律。

王夫之在1679年到1688年期间*写成的《张子正蒙注·太和篇》里,简明扼要地指出:“于太虚之中具有而未成乎形,气自足也,聚散变化,而其本体不为之损益。”作为自然界物质根源的“气”,充满在宇宙空间之中,它有时聚合,有时分解,变为各种形态的物质,但其本身总量没有生灭增减。在这里,王夫之不仅肯定了世界的物质性,而且还从数量关系上阐明了物质不灭的客观规律。他还举了三个实例加以论证。第一个例子,是说一车木柴燃烧以后,变成了火、烟和灰,但组成木柴的物质,并没有消灭,而是各归其所,只是人们不易看到罢了(“车薪之火,一烈已尽,而为焰,为烟,为烬;木者仍归木,水者仍归水,土者仍归土,特希微而人不见尔”);第二个例子,是说一锅饭烧开时,水汽翻滚升腾,逸出锅外,但若锅盖密闭,水汽就抑郁于锅内,不会减少(“一甑之炊,湿热之气,蓬蓬勃勃,若蠹盖严密,则郁而不散”);第三个例子,是讲水银遇到火,则成为水银蒸汽“飞”掉了,看来“不知何往”,但并没有被消灭,最终仍“归于地”(“汞见火则飞,不知何往,而究归于地”).

王夫之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这样生动地论述物质不灭的原理,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而且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种种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发展了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传统,为主张变革、反对倒退的政治路线提供了思想武器。

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是现实阶级斗争的一面镜子。王夫之的物质不灭原理的提出同当时儒法斗争有什么关系?三百多年来,这一科学的创见又为什么在我国科学技术史中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和反映?当前,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和总结围绕着王夫之的物质不灭原理的提出和湮没而展开的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是很有必要的。

*《王船山学术讨论集》,下。周调阳:《王船山著述考略》,中华书局,1965,北京。

“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王夫之物质不灭原理的提出,不是什么“天才创造”,更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有它深刻的社会政治思想根源的。

明末清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代,社会阶级矛盾激化。明末农民起义的革命暴力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揭露了程朱理学的腐朽和虚伪,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给当时思想政治领域里的儒法斗争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王夫之代表了地主阶级的革新派,对大地主封建统治的黑暗腐败极为愤慨,企图通过一定的政治变革,来摆脱封建社会的严重危机。针对儒家以古非今反对变革的谬论,他高度赞扬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的行动,是“势之所趋”;明确提出历史发展有其必然的趋势和规律,决不是由唯心主义的“天理”所决定;认为治理国家只能是“就事论法,因其时而酌其宜”。这种鲜明的法家主张,对儒家所谓天道不变的唯心史观,是一个有力的批驳。

王夫之这种主张变革、反对倒退的政治立场,决定了他要对程朱理学进行揭露和批判。

程朱理学鼓吹:物质一分解,就消灭了,再也不能恢复为物质性的东西了(“凡物之散,其气遂尽,无复归本原之理”《二程粹言》,卷十五);最初物质又是由绝对观念的“理”所派生的;物质是可以消灭的,而“天理”是永恒不变的。也就是说,那套腐朽的封建制度和“三纲五常”之类的宗教信条,是推翻不得的。显然,封建统治阶级竭力宣扬这套东西,完全是为了束缚和压制劳动人民的反抗。

针对这种反动说教,王夫之发扬了勇于批判的战斗精神,打入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营垒,击中其要害,暴露其反动理论依据,揭示其错误所在(“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老子衍·序》),展开了对反动理学的清算、批判。朱熹曾经把宋代唯物主义思想家张载关于“气”可聚散不可生灭的物质不灭思想萌芽*,说成是佛教唯心主义;王夫之针锋相对地指出,张载的观点正是“辟佛、老而正人心”,而朱熹关于“天理”的说教,恰恰就是佛教唯心主义的变种。在斗争中,他继承了历代进步思想家朴素的唯物主义传统,指出:物质本来就是客观存在,物质的消散变化,并不是物质的消灭,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生非创有,死非消灭,阴阳自然之理也”《周易内传·系辞上传》)。构成自然界万物的基本物质——“气”,聚合就形成各种形态的物质,分散就回到宇宙空间之中,虽恢复了它看不见、摸不着的本来无形状态,但并不是物质本身的消灭(“聚而成形,散而归于太虚”,“复其絪縕之本体,非消灭也”《张子正蒙注·太和篇》)。并且还进而列举实例,对他提出的物质不灭原理加以科学论证,这就进一步发展了张载的“气”可聚散不可消灭的观点。

王夫之所以能够这样阐述他的物质不灭原理,更重要的还和他批判了“知在行先”的理学唯心主义的“知行观”,坚持“行先知后”的朴素唯物主义“知行观”,注意总结了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经验密切相关。王夫之研究问题,不从主观冥想出发,而是重视“考证”、“质测”(实验);他的考证又不局限于书本,而是注重考察实事实物。据他的儿子王昶记载,王夫之“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人之所忽,必详慎搜阅之,而更以闻见证之”(《姜斋公行述》)。在他所生活的时代,由于资本主义在我国已有萌芽,开始出现了规模较大、内分工明确的手工作坊。在制墨作坊内部,有的从事烧柴取烟制墨,有的

* 张载:《正蒙·太和篇》。

雕琢印模,也有搞书画美化的,王夫之从劳动人民烧柴、取烟、制墨的生产过程得到启发,认为“油薪熬于空旷,烟散而无纤埃;密室闭室,乃有煤墨”(《俟解》)。他在观察了烧汞炼丹后指出:“汞受火煎,无以覆之,则散而无有;盂覆其上,遂成朱粉”(《俟解》)。正是在接触考察这些生产实践活动中,王夫之注意研究物质变化的现象,这为他科学地论证物质不灭原理,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

由于所处时代和阶级的限制,王夫之的思想体系不免还夹杂着一些唯心主义的糟粕。但是他在三百多年前提出物质不灭原理,较早地揭示了物质不灭这一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在我国自然科学史和哲学史上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二

“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王夫之阐述他的物质不灭原理和朴素唯物主义的大量著作,直到鸦片战争后才得以问世,整整被湮没了150年。而在出版以后的一百多年,他的物质不灭原理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除了在寥寥可数的几本哲学史著作中有些介绍外,一般自然科学书籍几乎没有反映,甚至连搞化学的专业人员,也很少知道王夫之提出过物质不灭原理。这完全是儒家尊孔复古和崇洋卖国路线的罪过。

封建社会末期,大地主统治阶级用行政力量把程朱理学强加在人民头上。和王夫之同时期的清王朝宰相李光地,精心编纂了一部作为钦定本的“朱子全书”,竭力主张“诵师说,字章句,佩服儒者,屏弃异端”(《清史稿,碑传集》,卷十三,李光地篇)。强制人们“近不敢背于程朱,远不敢违于孔孟”,许多新鲜活泼的思想创见遭到了排斥和扼杀。王夫之阐述的物质不灭原理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直接冲击着程朱理学的理论依据,被统治者视作洪水猛兽,横遭压制和破坏。当时,王夫之的一些诗词著述,经他家属朋友的手抄和刻板,已经有所流传,但都被统治者斥之为异端邪说,列入禁书的全毁书目之中。至于王夫之的一些政治性著作,如《读通鉴论》、《黄书》、《噩梦》,以及《张子正蒙注》等著作,更被严加禁止,无法出版。王夫之的后继者戴震,曾经愤懑地抨击这种情况,尖锐地指出:“后儒以理杀人”(《戴东原集》,卷九)。这是对当时程朱理学卫道士们拼命扼杀进步思想的深刻揭露。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人民头上又多了一条崇洋卖国的思想绳索。尊孔复古和崇洋卖国相结合,就成了一百多年来中国近代史上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障碍。

中国近代尊孔卖国的鼻祖曾国藩,以“赞助”刊刻《船山遗书》为名,对王夫之的思想极尽歪曲之能事;胡说什么王夫之的思想是“近继宋儒,远绍孔孟,讲求育物不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船山遗书序》),公然把一个法家唯物主义者,歪曲为儒家正宗,妄图以此贬低、抹煞王夫之进步思想的光辉。就是这个曾国藩,对内疯狂扼杀民族进步文化,对外跪倒在帝国主义脚下,叫嚷乞求洋大人是“第一要务”。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那些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从曾国藩之流到独夫民贼蒋介石,他们一手拣起孔孟之道的软刀子,一手又拿来帝国主义给他们的洋刀子,大砍中国人民丰富的文化遗产,把我国历史上劳动人民创造的许多科学成就长期打入“冷宫”。

解放后,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伟大祖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事实充分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尊孔与反孔的斗争并没有止息。党内出现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刘少奇、林彪一伙,既是当代的儒,

又都是投靠苏修的大卖国贼。他们在文化领域内竭力推行“基本照旧”的反动方针,在“全盘西化”的基础上,大搞“全盘苏化”。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的旧学校里,孔孟程朱之流和西方资产阶级“权威”,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外国文献上没有记载的都不认为是科学,洋人“学者”讲的话,被奉为“金科玉律”。有些人深受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对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视而不见,文化大革命前的旧化学教材,对王夫之在物质不灭原理方面的伟大创见只字不提,却大力推崇外国“学者”,这正是尊儒崇洋路线造成的恶果。

*

*

*

王夫之物质不灭原理的提出和被湮没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我国历史中,任何一个科学发明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在同儒家路线激烈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这个斗争始终存在,而且必然是整个社会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历史上,不少法家和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家,以及许多科学发明家,正是在同儒家路线斗争中,用唯物论战胜唯心论,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许多科学创见,作出了不少伟大的发明创造,从而促进了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在儒家路线的破坏下,也有不少杰出的发明创造被长期湮没,秦汉时期极有价值的《汜胜之书》、《四民月令》等多种农书,而今都已失传。北宋时期发明家毕升,在世界上第一个发明活字印刷术,对人类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史书却不予记载。著名的法家、科学家沈括改革历法,很切合农业生产的需要,在当时也因不合儒家经义,遭到顽固势力“怪怒攻骂”而不被采用。这都一再证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今天,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科技战线已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在自然科学领域内,要把孔孟之道的流毒批深批透,把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还需要我们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只有批判尊孔复古、崇洋媚外的思想,才能正确地接受中外历史上的丰富文化遗产和先进科学成就,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